

丁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中等强国面临“时代转折”

1月21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世界已进入一个大国竞争充满风险的新时代，中等强国需要联合起来以求生存。”他还警告称，“如果我们不在谈判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卡尼这一表态不仅让中等强国这一国家类型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将该类国家在时代转折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呈现在大众面前。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

中等强国已是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

中等强国是指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处于世界阶梯体系的中间阶级，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显著的影响

力和地位，具备对资源运用和事态进程相当强大的驾驭把控能力，是仅次于世界主要大国最具力量和影

响的次等强权国家。参照上述定义，当今中等强国应该是 10 ~ 20 个类似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土耳

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南非这样的国家。观察这些国家不难发现，它们既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不同于日本、德国和印度那样的准世界性大国，但同时又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多是具有一定战略辐射半径和相当权势吸附能力的地域性大国，能够在所参加的国际活动领域采取相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能够为自己开辟出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专攻领域和折冲空间。综合来说，中等强国对全球和区域格局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整体实力增强，战略地位提升。

从全球层面看，中等强国在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and 影响显著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变量和重要推手。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土耳其等中等强国牵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反对强加不成熟的改革方案或采取零散处理的做法，认为应通过充分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使改革更有效率和透明，而不是强行推动各方尚存巨大分歧的改革方案，成为打破“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希冀以“抱团捆绑”方式单方面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图谋的先驱力量。2018年10月，作为中等强国重要代表的加拿大召集12个世贸

组织成员在渥太华开会，达成维护争端解决机制等诸多共识。这个中等强国倡议组织也被称作有关世贸组织改革的“渥太华集团”，尽管这些国家劝说美国不要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和任命的努力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既得利益维护者与后起分权者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二十国集团机制内，中等强国第一次集体性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场地中央，由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发展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和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且，在G20机制内与传统势力（G7）和新兴群体（BRICS）构成三足鼎立、比肩并列的格局，推动中等强国的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议程设置权全面提升。

（二）在热点问题上展现奋进的斡旋者姿态

在近些年全球多处异常火爆的热点事件和重大问题上，中等强国在“灭火、降温”焦点局势的表现同样格外出彩亮眼。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波兰政要数次前往乌克兰，“调停”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双方同意签署的和解协议就是在波兰外长的主推下达成的。2015年11月，俄土发生“军机门”事件后，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作为能够同时给普京和埃尔多安递话传信的“最佳中间人”，需要哈萨克斯坦扮演斡旋双方的“协调者”角色，也正是哈国的居中调解为土俄两国关系探底回升、冰释前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尤其在本次“俄乌冲突”中，有些国家在选边、对冲或疏离等对外战略的选择上摇摆不定，但许多中等强国利用大国地缘政治较量和意识形态博弈激化放大的时机，积极开展居间调停、多元平衡和“小众外交”行动，促使自身国际地位和战略价值得到显著提升。土耳其率先于2022年3月促成了俄、乌外长在冲突之后的首次直接接触，在欧安组织会议中发起了“调解促进和平”的倡议，使其能够成为各派势力争取的利益交集，容易与相关各方保持温和、开放的对话渠道。2025年4月，土耳其再次主持了俄乌之间的多轮直接谈判，推动双方达成换囚等实际成果。2023年8月，乌克兰问题国

际会议在沙特西部海滨城市吉达举行，超过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2025年3月，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先后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会谈，就俄乌冲突相关问题开展协调。

（三）推动多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在地区事务上，随着中等强国

对外行为愈发活跃和自身利益的日渐显现，中等强国已然成为推动从次区域到跨区域的各种机制和格局进行改组、整合的关键力量群之一。比如，韩国不断加强东盟各国的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事业，积极促成建立“中等强国集团”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土耳其、埃及、伊朗和沙特作为中东地区的中等强国，对中东变局之后区域国际关系重组和地区秩序重构的意义

愈发凸显。尼日利亚在推动西非区域化和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发展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中，发挥着“领头雁”和“发动机”的作用。这些都能使人们隐约感受到中等强国正成为当今多极世界中一股重要力量，在国际和区域议题上所潜藏的巨大威力和能量，中等强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中等强国将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寻求联合自强

卡尼表示，“大国可以单打独斗，但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不行。”这句话虽然不算完全准确，但也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中等强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发展和获取影响力的方式。在国际体系中，不同于大国能够独立自主主持和管理多边合作机制，中等强国倾向于依靠多边体系和规则来缩小与大国实力的差距，倾向于通过寻求合作来增强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倾向于借助多边机构来促成国际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由于中等强国没有足够的能力采取单方面行动，想让国际机制决策结果接近和符合它们的利益偏好或者强烈愿望，必须获得多边主义网络化权力的支持，更需要借用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来弥补自身能力和影

响的不足，同时避免独立地位、行动自由受到损害或霸权威胁。而且，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制度赋予中等强国更强大的制度性权力，使其在角色定位和功能属性上能够参与和坚持国际秩序的系统性转变，而不仅仅是突出调解者、追随者和规范接受者的作用。因此，多边主义自加拿大推出中等强国外交伊始便相伴相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与中等强国的存在是相辅相成的，其重要性因两者间彼此交融互动的正相关性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多边主义不断内化为中等强国核心价值取向之一。一般来说，大国之间能够有效沟通和协调有利于全球性多边主义机制发挥作用，而大国之间竞争加剧则会导致多边机制和

国际组织的力量削弱。由于美国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工具，不仅促使大国之间结构性矛盾呈无限放大的趋势，还加剧了大国之间意识形态对立的阵营化叙事和权力分配竞争的集团化趋向，从而对大国协调进行多边合作构成较大冲击，给全球多边秩序和多边机制带来严重的破坏。当前，某些霸权大国将贸易、金融、供应链“武器化”引发多边机制效率下降，不仅使得传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产生动摇，也导致中等强国难以通过既有多边框架维护自身利益。

中等强国虽然辨识度和显示度相比大国偏低，在推动国际体系演变上也不具有比肩和匹敌大国的实



力与地位，更不能像大国那样在国际体系变迁中起到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但中等强国是除大国外综合实力排序最靠前的群体，能够在相对有限范围内影响国际体系的形态和性质，对国际格局的“极化”运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导向性、关联性作用。纵向梳理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轨迹发现，大国掌握着全球秩序转换和国际体系变更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体系中战争与和平的形态，世界是两极化还是多极化趋势由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决定。但在大国权力政治的因果关系之外，国际秩序演化还同中等强国的变动构成因果关系，包含着中等强国参与力度和介入深度强化和助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大国是全球格局体

系中的“头部”国家，中等强国则是等级结构体系中的“颈部”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或改变大国的战略意志。中等强国绝非大国附庸，更不会屈从大国的任意摆布，在大国竞争中总体保持相对中立或灵活的立场，倾向于寻求以战略自主为导向的多元平衡外交，即便同某些大国结盟也不会完全依附或者过度听命于该大国。

历史经验表明，当中等强国尽力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在大国博弈之间推动有利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多元平衡外交，时常能够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超水平发挥”。事实上，卡尼在演讲时也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退，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

须承受的一切。”他甚至呼吁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中等强国必须团结行动，因为“当我们只与霸权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我们是在弱势地位进行谈判”。自21世纪以来，中等强国依托国际格局东起西落、南升北降的有利时机，借助全球主要战略力量分化改组的发展态势，积极参与编设海洋、极地、外空、网络、核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的法规条例，在制度安排和机构部署上的国际话语权和综合影响力不断提高。因此，随着整体实力的增强和大国博弈的加剧，给中等强国寻求更大自主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中等强国也在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减少对大国或超级大国的依赖。同时，为弥补外交政策中竞争优势的相对不足，中等强国还将利用大国竞争加剧的缝隙，充分发挥自身在特定“专精”议题中领导者的优势，通过建立功能导向的议题联盟和多边合作机制，力图在技术性专业领域主导或者引领全球治理的方向。🌐